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匡扶人文情怀

——读报摘记与思考

孔汝煌(杭州)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参加就业问题座谈会,讲到情商与智商的关系时说:有时候情商比智商重要。在讲了原因后又说:当然,要解决实际问题,仅靠情商还是不够的,最终情商要通过智商才能起作用(见2013.8.5光明日报2版施景铃文《情商与智商》)。这无疑提示人们:人文情怀还须科学精神的匡扶。

这使笔者想到近年来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怎么看“愚公移山”?这个出自《列子·汤问》的寓言故事,在特殊年代,经领袖人物的提倡,作为“比喻作事有毅力、不怕困难”(《辞海》解释),本意极好。但在狂热的年代,有人赋予了神圣的普遍价值意义。上世纪末有位诗人写诗,大意说,如果为了通行便挖山不止,不知变通,便真是愚不可及,意在讽刺蛮干。几年后,有位诗人写文章加以讨伐,上到了爱国主义的高度。最近,被称为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杜维明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儒家思想核心观念之一的“天人合一”时说:大禹治水是荀子“天生人成”的最好价值体现。相反,完全不能认同愚公移山。表面上是体现了人的能力,但仔细想想为什么(见

2013年6月30日钱江晚报B4版)?笔者“想想”后以为:愚公移山,就事论是:愚公的情商不完整,情商的核心是知己知人,他了解自己的移山决心,又怎能替子孙后代作主一定会世代挖山不止?智商则更成问题,怨不得智叟的嘲笑;在价值观上说,是人主宰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有大寨人曾经迷信人定胜天,真学愚公挖山不止,不思科学种田,却终不能脱贫。形成显明对照的是袁隆平胸怀科学报国,虽备受“李森科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挠、打击,却坚持水稻杂交试验,终为人类的吃饭问题作出历史性贡献。大寨愚公当时的徒劳,失在科学态度;袁隆平的成功在于情商与智商的统一,报国爱民的人文情怀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融汇。

最近看到一篇报摘,说是中国人看莲荷,最看重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德国人则在显微镜下观察莲叶不亲水的微细结构,从而发明了墙面的自净涂料,灰尘不必清扫,下雨就干净了(据2013年5月15日《人民日报》阿来文《看莲叶的差异》)。著名未来学家美国奈斯比特夫妇,于6月



15日在杭州出席浙商投融资大会作主题演讲时,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这位奥地利才女也拿莲叶说事,说罢莲叶的自净机制被仿生学应用到不少领域,又话锋一转说:这种代表科技创新的“莲叶精神”,还有相反的启示:阻挡一切外面的新思想、新事物进入,不愿吸收、接受借鉴新事物(参见2013.6.16钱江晚报A6版黄晶晶报导)。面对同一张莲叶,中国人的知觉是伦理的,审美的,求善求美的;德国人的态度是科学的,实用的,即是科技的,求真求善的;多丽丝·奈斯比特的认知是哲学的辩证认识,求真求善的。比较而言,科学主流是求真务实,强调排除主观因素,且不主张急功近利,从而使科学的认知相对客观理性,因而常常对主观感性较多的人文认知起到匡扶作用。

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决策与脑国际研讨会”于2013年8月9日在京召开。其研讨主要范围是行为决策与脑科学的关系,并将成果应用到管理、金融、生物、医学等诸多领域,促进跨学科的综合发展(据2013.8.11《光明日报》1版齐芳报导)这使笔者回想起60多年前的往事,当时的阶级教育经常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泰勒铁血工资制”。现已为泰勒正名。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人泰勒对工业化的贡献足以媲美于英国人蒸汽机的发明与电的应用。泰勒于1911年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写道:“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

法。协调,不是不和别人合作,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参见2013.5.26《钱江晚报》B7版翁礼华文章)今天看来,泰勒的科学管理是行为决策脑科学的管理学应用,其管理文化正是人文关怀与科学方法相融的创新,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而偏狭的政治功利观,歪曲科学态度和事实,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越穷越光荣”提供“理论”支持,极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里可见得,政治文化中价值功利观的善意与否又直接影响以致决定了科学成果的正能量是否得以发扬。泰勒倡导的管理科学文化在我国经历了对偏狭政治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终得拨乱反正,长达半个多世纪,损失大,教训深,也从侧面说明科学精神对人文情怀的匡扶并不轻松。

也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为传扬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原本的简单事实只是一对蒙族小姐妹,11岁的玉龙和9岁的玉荣,代父牧羊,在突来的风雪严寒中几陷绝境,被下放在此劳改的右派分子哈斯朝鲁发现并救护。在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界限模糊的当时,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借此塑造了为保护集体财产——追赶遭阶级敌人盗窃的羊群——而遇险,后被一位扳道工人救护的“英雄小姐妹”故事,真正的救助人哈斯朝鲁却被说成就是那个盗羊的昔日牧主。报导这样写,剧本这样演,哈斯朝鲁因此坐牢,经反复上诉,直到1979年,胡耀邦批示“彻底甄别处理”,



才得平反。(据《读书文摘》2013年2期李新宇文章《“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众所周知,胡耀邦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主要推动者。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议上,主持讨论党史和党建教研室拟出的教学方案时,提出总结党史的功过是非要以实践检验为依据,而不是哪位领导乃至最高领导的讲话。学者认为,胡耀邦是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据2013.7.15《学习时报》沈宝祥父《胡耀邦提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革》)。历史再次警示:扭曲的功利价值观将是怎样的祸国殃民,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有唤回良知、自我净化的强大正潜能。

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社会的诚信建设。诚信之道重在修身自律。古人说,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诚意,诚意才能正心(见《大学》),格物致知即是现代所说的科学观察与研究,“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明察事理与诚意正心是互相作用的。且看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根(1866-1945)是怎样在果蝇遗传的实验中“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见《中庸》意即次于圣人的贤者,若能推究细小物理,也可达至诚明之境)的。摩尔根于1905年开始研究遗传学。1915年,摩尔根和他的学生已完全可以用染色体学说解释孟德尔遗传学,出版了《孟德尔遗传的机理》,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摩尔根通

过科学研究、他的学生、他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部影响美国和世界的科学。摩尔根学派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其中三位:摩尔根(1933)、穆勒(1946)和比德尔(1958)分别获得诺贝尔奖。属于摩尔根谱系的科学家至今仍活跃在各国相关的科研领域。摩尔根及其学派的科研经历和成就有以下三点尤为值得关注。首先是,摩尔根本人原先坚决反对达尔文有关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反对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反对威尔逊支持的染色体遗传学说。但在果蝇遗传学的实验事实面前,他对自己曾经的三个主要错误认识纠正得如此迅速、彻底,正是采用了他曾经发文嘲笑过的孟德尔的“因子”和数字分析推理方法,使果蝇遗传学研究有了多次突破性发现。其次是摩尔根并未在1933年当年去领诺贝尔奖,主要原因是他刚发现的果蝇唾液腺有多线染色体,他的理论推导立即面临物理的检验,直到答案令他放心的次年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其三是摩尔根学说在中国和前苏联的特殊时期曾深受与权力并行的“李森科主义”伪科学的打击,摧折了不少精英,阻碍了科学发展,教训深刻(所引述关于摩尔根学派的史实依据《新华文摘》2013年13期饶毅文《果蝇里的宇宙》)。摩尔根的科研经历和高尚人品启示人们:“格物致知”,“曲能有诚”,“诚则明矣”。“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科学实践砥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匡扶人文情怀,一路走来,备极艰辛。

